

西学先导:吴汝纶与桐城学堂^{〔*〕}

○ 刘 燕

(安庆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大儒,享有“海内大师”“古文宗匠”的盛名。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巨变中,他竭力与时俱进,积极探索西学、介绍西学、倡导西学、运用西学,形成了超越于同时代人的中西合璧的思想体系,完成了从古文宗匠向西学先导的身份转换。他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西学先导改革与实践新式教育,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桐城学堂,为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吴汝纶;西学先导;桐城学堂;新式学堂

吴汝纶(1840-1903),晚清著名学者、杰出教育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吴汝纶接触过“洋务”,支持过“维新”,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他竭力与时俱进,积极探索西学、介绍西学、倡导西学、运用西学,以开放的视野、务实的精神、实干的作风,形成了超越于同时代人的中西合璧思想体系。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极具先锋性和超越性特质,成为晚清教育改良的旗帜。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在经历数十年西学积累和教育实践后,创办的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学堂,其办学理念、办学模式集中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是吴汝纶教育思想体系的结晶。

一、从古文宗匠向西学先导的身份转换

吴汝纶博学多才,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他认为:“中国

作者简介:刘燕(1971—),安庆师范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系2015年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招标项目“吴汝纶教育改良思想研究”(SK2015 A139)的研究成果。

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於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乎吾目中。”^[1]被时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仕人,吴汝纶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在‘桐城派’这个团队中,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好友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指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2]

1. 较早系统学习西学,先声先导西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吴汝纶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开风气人物。在曾国藩幕府任职期间,曾协助曾国藩办洋务,此时的吴汝纶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从1867年的日记看,他已开始研究中外关系,搜集西方各国情况。1869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与日本柳原前光使团交往的情况,“倭人于西洋之学近颇研求,曾遣数十人西行游学,此数十人,幼孩居多。”^[3]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皇朝史略》《日本地輿图》及《官位簿》等有关日本书籍。^[4]“晚间有广东人见招,作西洋酒食,有通西洋文字者,以西洋字母见教。”当即学会了A、B、C、O、U等字母。^[5]从此,他开始用心汲取西学,并致力于“以新学倡天下”。^[6]他逝世后,门生贺涛在墓表中说道:“论世事主变法之说,十年前,吾国不知外事之时,固已究考西学,因事托意,发为文章,西书日多,学益博奥精邃。”^[7]吴闾生所撰《先府君事略》亦云:“于西人新学新理尤兢兢,尝欲取彼长技,化裁损挹,以大行于天下。”^[8]

吴汝纶一生中至少研读过上百种西学书籍,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机械制造、农学、商学、银行、法律、哲学及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他的著述中经常援引的中外报名粗略统计也近30种。如1867年12月16日日记中记载“是日见新闻纸,谓法国将与布国战。是西洋各国有不和之征,中国之利也。”^[9]他的弟子李景濂描述了吴汝纶如饥似渴地追求西学的情景,“自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文,与其人士之居于是或进而与相接着,无不广览而周咨也。”^[10]广泛涉猎西方著作,为吴汝纶日后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系。吴汝纶还通过与外国人交往,从中获取新知。其子吴闾生说:“先君喜结纳外国人,与欧美名士上下议论……英美人林乐知、李提摩太之属皆慕交先君,美教士路崇德尝语人曰,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吴先生者,真东方第一人也。”^[11]

随着“广览”的深入,吴汝纶对西学的认识不断加深,光绪二十三年,他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在回复严复的信中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赫氏之道……斯以信美矣!”^[12]严复也对吴汝纶的西学领悟力大加钦佩:“某沉潜西籍数十年,于彼中玄奥不能悉了也,先生往往一二语已洞其要,中外学术一贯固如是乎?”^[13]清晚期,时人对吴汝纶西学先导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自望溪倡古文义法,刘姚继之,桐城一派遂为海内正宗,绵延二百年,而挚甫为之殿;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尤喜言西学,异乎拘

墟守旧者也。”^[14]

吴汝纶在广泛关注西学内容和发展动态的同时,还时时向学生强调“西学”的积极意义,“时局多变,后生为学,若不问津西国,终难成有用之才。”^[15]指导他们阅读时新的“西学”书籍,“洋务,国之大事也,诸生不可不讲,今所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西人李提摩太所编,其中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中国。又有《自西徂东》一书,所分子目甚多,每篇皆历道中国盛衰,而结以外国制度,亦甚可观。”^[16]甲午战后,他在《与冀州绅士》信中论及时事时说“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有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决不会似今日之束手瞪目,坐为奴虏万一不能仕宦,而挟吾学术,亦足立至殷富,自全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17]

吴汝纶作为一个以封建正统、复古保守为基本思想特征的桐城派中坚人物,一位对英文、日文一字不识的儒家学者,不顾非难,敢为人先,潜心西学,经世致用,显示出踏实前行、与时俱进西学价值观,他的这些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产生出极大的推动作用。

2. 将西学观念引进旧式书院,先行先试教育改良

吴汝纶一生非常注重教育,早在担任深、冀二州知州时,他便倾力地方兴学,为官一任,教育为先。经过他的努力,深、冀二州“文教斐然,为冠畿辅。”^[18]尤其1888年入主保定莲池书院之后,是他面对日益破败的时局,深入反思与寻找民族出路尤其是教育出路的重要时期,是他的教育思想日渐成熟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思考与学习,促成吴汝纶较为激进的、极具超越性的教育变革思想。

讲求时务、崇尚实用。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屡次进犯,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吴汝纶愈加强烈地感受到导致中国贫弱、社会危机、灾难连连的重要原因在于学术文化空疏无实、脱离实际,要实现教育救国,必须学习西学、崇尚实用。“时局多变,后生为学,若不问津西国,终难成有用之才。”^[19]1897年,他在《送季方伯序》一文中写道:“循是不变,穷益穷,愚益愚。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吾日率吾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而决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资乎外国之新学。”^[20]要想改变为富民、智民的教育,必须依赖于新式教育,讲求时务以图自强,广开民智以求国兴。

东、西文学堂开办后,吴汝纶写信到冀州,劝冀属后生来莲池书院接受学习救国之法。信中写到:“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决不似今日束手瞪目,作为奴隶,万一不能仕宦,挟吾学术亦足立致殷富,自全于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21]至此,吴汝纶对于教育的理解已远远超出德政范畴,而是将其视为救国救民之道。

废科举、重学校。吴汝纶是同治四年进士,由科举遂走上入仕的道路,吴汝纶正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按理说,他应该对科举制度感激不尽并悉心维护。然而他在目睹国家在强国的坚船利炮下溃不成军、百姓生灵涂炭之后,痛定思痛,转而抨击科举制度,他曾激愤地说:“他国人人有学,唯恐民愚,务沦其智。

中国不唯民愚也,乃至满一国尽愚士、愚卿大夫。”^[22]锋芒直指以科举制度为中心、以传授周孔经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教育。他呼吁教育革新,并积极展开教育实践,被日本人早川新次称为“方今东方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

戊戌变法中,吴汝纶批评康有为“科举不能骤废、考试改八股为策论”的主张。明确提出“直应废除科举”,向旧的教育制度提出挑战。给李季高的信中针对光绪变法诏书写道:“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23]此后,他多次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表达自己惊世骇俗的观点,“吾谓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24]“愚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选士”“学堂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25]

他尖锐地批评张之洞等人“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的谬论,“事有当旷然大变与天下更始者,学堂是也。今与科举并行,科举易,学堂难,谁肯舍易从难?此安能并行不悖哉!”^[26]正如吴汝纶所言,科举与学堂并行不到两年,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有的地方只是虚与委蛇,把书院的招牌换成学堂的名称,教学依然没有变,“并存论”实际上没有现实基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才终于废除,新旧教育制度并存的局面得以全面改变,新学制成为唯一合法学制。这也表明吴汝纶的主张比起同时代改良派的主张更具先导性和可行性。

旧式书院里的新机构。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吴汝纶已在莲池书院设新式学堂(西文学堂),比光绪诏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早两年,1899年又设东文学堂。西文学堂聘请英国人士贝格樨教授英文,“或望有学成数人,亦渐于学校中开此风气。”^[27]东文学堂聘请日本人中岛裁之为教习,选拔书院高材生分往两班,学习日文、英文及欧美历史、政治宪法等。学堂促进了莲池书院教育内容及办学模式的近代转型,使书院培养人才的素质发生现代性因素的转向。“即此一端,吾国才士,已不暇为;其不才,则为之而无益。若乃天算、化学、制造、格致,则皆所谓专门者,非风气大开,决无专习一业之人;非风气大开,即有一二人能习其业,亦于国无能损益也。”^[28]这样,吴汝纶在书院这种旧式教育机构的躯壳中注入了更多新式教育的内容,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

二、以先进办学理念创办最具近代意义的新式学堂——桐城学堂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吴汝纶对中国传统教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忧心忡忡,他意识到中国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小修小补,而应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他长期探索形成的超越于同时代人的教育思想,结合东游日本考察学制的实地勘察和学习,使他完成了由养士教育到新民教育的思想转变。从日本归国后,他立即着手实施兴办桐城学堂的计划,以体系化的近代教育理念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

1. 办学指导思想:“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29]

吴汝纶既倾心旧学,又提倡西学,逐渐从传统的士人转换为新式知识分子。吴汝纶常吟“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何当泛扫浮云尽,天汉东西一

色明”。^[30]他希望“中”与“西”平分秋色,二者各领半壁江山。在主持莲池书院期间,他曾力图将新学引入莲池书院,书院的教学内容出现了中西交融的态势,透露出近代西学开始渗透书院的信息。

在考察日本学校办学情况的过程中,吴汝纶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好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他认为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若但讲吾国旧学,甚多缺点,但以此遂弃髦吾圣经贤传、诸史百家,此必不能。”^[31]他认为不能因提倡西学而忽视中学,对时任日本高等教育会议议长滨尾新的主张“处万国交通时,非一国之说所能独立,必兼各国之长,与之角胜,乃能与列强并列于世界”^[32]非常认同。吴汝纶还多次和日本学者谈及“教育之精神”,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所言:“敝帮教育,以融合调和东西洋之思想为目的……教育精神毕竟在伦理,今日之伦理,非打东西之粹而为一治不可”,“正德、利用与厚生,学问之要,三言备之。贤者当合并东西,陶熔一治”,吴汝纶信然:“正德、利用、厚生,实括东西学之大成”。^[33]通过考察交流,吴汝纶基本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办学理念,桐城学堂即在此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创办的。“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各国駸駸而内,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前数十年,即耳食西学尚可勉强支柱,此后诸国内犯日深,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国人才相抵,一不能抵,则优胜劣败,不惟无处可谋衣食,兼恐种类遂为勃者所兼并,此其痛迫切身,实非小故。……诸君年力鼎盛,不从此勉强学问,取长辅短,仍傲然自足,不肯低心取益。将来与各国来客并立,有用无用,巧拙悬殊,何以自全视息?窃为诸君危之。”^[34]这份言辞恳切、振聋发聩、洋溢着爱国热忱的“招考说帖”,充分阐述了他务求中西交融的教育主张,显示出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与勇气。

2. 办学定位:“收效最速者,无如专门学校”^[35]

吴汝纶认为实业教育应放在所有教育的第一位,特别是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某日“山根少将来谈,问吾儿欲专门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也!”吴氏深受触动:“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36]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吴汝纶认为,只有创立专门学校才能用功最简,收效最快,这才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一种急救办法。“专门之业,如天文、理化、博物、制造等,皆精奥难学,不易得师,其农工商业,虽家国富强基础必不可缓之事,而吾国尚区而别之,以为非士人之业,今亦未便创办”,“法学、理财学,此二学尤吾国所急需”^[37],以大学为目的的普通中学虽然必要,但“此学与教育为第三义,第一义以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38]“蒙养之学,普通之学,今皆不必立。其大学则程度高,非初学所能骤急,念用功最简,收效最速者,无如专门学校。”他决定把桐城学堂建成一所教授法学、理财学的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专门学校,目标在于快速培养法学、经济二科实学人才。1904年,桐城学堂将首批招生的两个班合并,根据学生年龄、学业情况、个人意愿等情况,从中选取20余人编成师范班;1906年,经各方公议,学堂在师范班的基础上

再创设师范学校,为学校教育培养师资。无论是法学、经济还是师范,桐城学堂始终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以致用、富国强民的实学之才。

3. 人才培养目标:“勉成国器”

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培养什么样的人,可从吴汝纶评注的早川新次《今代教育精神论》中得到答案:“行古今东西人之所未行,言古今东西人之所未言,知古今东西人之所未知,思古今东西人之所未思,新出机轴,别开典型,而不屑模仿是务者之谓开创主义;何谓人力主义?人类之活动力也……”吴汝纶读后大家赞赏:“所论开创主义、人力主义二事,均有绝特之识,非粗才所知!”^[39]按照今天的表述,学校应当培养学生自强自立的创新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综合能力,真实地传递出他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以救亡图存的心声。百余年后的今天,“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仍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教育之培养目标,这也佐证了吴汝纶思想的先进性和超越性。他为桐城学堂亲书的楹联与横匾中表述得更明确:“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题匾为:“勉成国器”。这副楹联已成为桐城中学百余年来办学宗旨和校训。事实证明,桐城学堂毕业生以后在政界、学界、军界、科学界、经济界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如:将军外交家黄镇;美学泰斗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著名作家方令孺、叶丁易、舒芜;两弹功臣、著名科学家方正知;两院院士孙德和、慈云桂、陆大道、杨善林、吴曼青、程和平……实现了吴汝纶兴办学堂的夙愿:“或为政治家,或为理财家,或为教育家,或为文官,或为武官,或为医学家,或为农业家,或为工业家,或为商业家,各由职业以开成国家之盛运,增进社会之文明。”^[40]

4. 课程体系架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早在桐城学堂创立之前,吴汝纶对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就做过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中西交融的课程体系,1901年在《与陆伯奎学使》附学堂书目中提到他对学堂课程的规划,他认为凡是有益于民生日用、富国强兵之学都可纳入教学内容,甚至包括维新派不敢引进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体现了吴汝纶“会通中西”“打中西于一冶”“取东西文明之粹打为一块”^[41]的办学思想。

桐城学堂创建过程中,吴汝纶依据学堂人才培养目标,亲自制定与近代学校制度相一致的课程方案。主要拟开办的课程有: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外国文、经济、博物、物理、化学、体操、图画等。后来因教师缺乏难以聘请,许多课程无法正常开设,实际上先只开设了国文、日文、法学、经济、算学五种。历史、体操等课程“间或课之”。^[42]1906年起,学堂课程开设基本完备。东文、法律、经济(理财)皆由早川先生指授,中文由姚叔节先生指授,翻译、体操听杨众先先生指授,英文、法文求得良师之后再行开课……在他所开列的课程目录中,与传统教育有联系的课程,只有中文和中国史,经学已经没有位置,完全打破传统以经史子诗为主的课程内容。教材内容由教师自编,教学方法以讲演式和注入式为主。由此,他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形成了近代教

育的基本课程框架。

5. 师资选聘:“西师难请,东师易聘”^[43]

早在莲池书院期间,吴汝纶率先创办东、西学堂,聘请英国传教士贝格蓐教授英文,聘请日本人中岛裁之为东文教习。当时,当局和社会对聘请西人教学均持否定和怀疑态度,且束脩偏高,不如先学习日文,“东文苟通,即西书皆有倭文译本,吾可遍览广学,又可赴日本研习专门之学。”^[44]桐城学堂创办之际,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师资,“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45]“凡讲西学,不请西人,亦必请日本人,若不化去中外畛域,而欲请中国人为师,此妄耳。”^[46]认为西学还是由精通于此的西洋人来教,然而,若延请西方国家的学者,“区区入款,万不敷出”;建议延请日本人为师,“近来西国学术,日本皆以精通,且别出新意,西师难请,东师易聘,其功效正复相同。”在日期间吴汝纶寻访到一位愿意到桐城教书的日本教师早川新次,在归国时将他带回安庆,聘请他做桐城学堂的东文和西文教习。并明确教师待遇:东文教习“岁送束脩银六百两正,闰加五十两,火食每月廿两”,“放暑假回国,应送川资六十两”。^[47]吴汝纶还考虑到若学堂无中学之师,“易招不知者诟厉”,拟聘请“通伯弟为中文教习,就近主持一切”^[48],姚叔节担任中文教习,杨众先教授翻译兼体操。又聘请浙江夏次岩、湖南刘时皆、怀宁葛温仲、寿州裴书田、颍州杨希悦等名师来校任教,保障了桐城学堂的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在日期间,吴汝纶特地向教育家长尾稯太郎请教了明治初年,日本为解决师资问题采取的所谓贡进生制度,“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间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人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49]因此,他建议“请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生为教习。”^[50]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1904年至1906年,桐城学堂先后派出20多人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以充实本校师资或服务社会所需。

6. 学堂管理:“各有职司,无相侵越”^[51]

在筹办桐城学堂的过程中,吴汝纶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办学文稿。在殷训夫所辑《办学公文稿》手抄本里,收录了桐城学堂办学重要的文献资料,包括《禀请开办学堂公呈》《公立议字章程》《续修议字》《禀请桐城学堂裁留冬款立案公呈》《本学堂学规》《吴挚甫创设学堂说帖》《吴挚甫先生招考说帖》等。这些文稿是桐城学堂最根本性的文件,是管理学堂的基本遵循和指南。依据桐城学堂章程,学堂的管理人员设总理一人,“主持堂中大纲”;分理二人,“一人管理支款、接待教习、约束学生、督察夫役,一人管理收款、负责田租”“各有职司,无相侵越”;管理人员的产生由公共议请,依据办事能力和品行端正;学堂实行财务公开,“堂中进出各项,十日一小结,一月一大结,每月出入总数,张榜门侧。每届年终,有总理、分理核结,编造四柱清单,刊印征信录,分散各乡,以期共见共闻,大昭公信。”^[52]对学堂管理人员的遴选、职责、待遇,以及财务的预算、会计和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学堂的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按《学堂学规》严格执行,内容体现了尊师重教、严禁不良行为、严戒慵惰散漫、严明考核奖赏,督促学生勤于

学习、敏于求知。《学堂学规》完全依据教学规律设定,摒弃封建礼教的束缚,体现了近代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的新观念。

桐城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式学堂,是吴汝纶多年教育理念的积累实践与全方位尝试,是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最具前瞻和理性的成功探索。他所倡导的会通中西学、培养经世致用实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宗旨,以及课程体系设置、师资聘任、教学管理等教育改革,确是开风气之先,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借鉴。

注释:

- [1][18] 赵尔巽:《清史稿·文苑传·吴汝纶》,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3、13443页。
- [2]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44页。
- [3][4][5]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
- [6] 贺涛:《吴先生行状》,《桐城吴先生(汝纶)文·诗集》,文海出版社(台北),1966年。
- [7] 贺涛:《吴先生墓表》,《桐城吴先生(汝纶)文·诗集》,文海出版社(台北),1966年。
- [8][11][13] 吴闿生:《先府君事略》,《桐城吴先生(汝纶)文·诗集》,文海出版社(台北),1966年。
- [9]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卷六》,丁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0] 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第1131页。
- [12][29][30]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147、459、466页。
- [14]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八九》,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484页。
- [15][19] 吴汝纶:《上李相国》,《吴汝纶尺牍(三)》,黄山书社,1990年,第43、43页。
- [16] 吴汝纶:《吴汝纶尺牍(一)》,黄山书社,1990年,第82页。
- [17][23][24][25][27][28]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365、194、365、355、248、256页。
- [20] 吴汝纶:《送季方伯序》,《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145页。
- [21] 吴汝纶:《与冀州绅士》,《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229页。
- [22] 吴汝纶:《答方伦叔》,《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182页。
- [26]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第460-461页。
- [31] 吴汝纶:《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辞》,《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450页。
- [32][33][41] 吴汝纶:《东游丛录》,《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725、757、767、731页。
- [34][35][37] 吴汝纶:《创立学堂说帖》,《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462、462、461页。
- [36] 吴汝纶:《教育卷第十》,《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第674页。
- [38] 吴汝纶:《与张尚书》,《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435页。
- [39][40] 殷训夫手抄本:《办公公文稿》
- [42] 汪年生:《桐中百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 [43] 吴汝纶:《与南乡绅士李与仙柏松如》,《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196页。
- [44] 吴汝纶:《与李季阜》,《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255页。
- [45][49] 吴闿生:《桐城吴先生尺牍》,文海出版社(台北),1966年,第55-59、55-59页。
- [46] 吴汝纶:《与方伦叔》,《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248页。
- [47][50][51][52] 吴汝纶:《开办学堂章程十七条》,《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196、410、465、465页。
- [48] 吴汝纶:《与桐城绅士》,《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456页。

[责任编辑:流金]